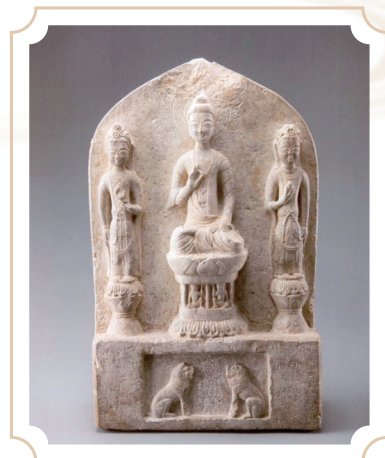




聊聊文物

从这铺弥陀造像 窥见大唐一角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马永伟

“鬓云欲度香腮雪，衣香袂影是盛唐。”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大唐”，不仅车马如潮、谪仙醉倒，更是山河窈窕、繁华九霄。唐代也是中国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佛造像更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的背后不仅是匠人高超的雕塑技艺，还承载着历朝历代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

在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铺由茌平区广平乡出土的背屏式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比丘尼行儒造弥陀像，为国家一级文物。

◀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弥陀造像

造像线条流畅精美绝伦

这铺造像通高52厘米，宽33厘米，背屏厚5厘米，为石灰岩质地。造像上刻有高浮雕三尊像，主佛高18.2厘米，结珈趺坐在束腰莲台之上，拈花微笑，表情平静，身着敞领袈裟。莲

座束腰处雕有两名力士，下为覆莲基座。

主佛左右两胁侍菩萨高18.7厘米，头戴花冠，前额梳刘海发式，跣足立于覆莲基座上，神态肃穆恭顺。左右两位胁侍

菩萨大小形同，但花冠、表情、项圈等却又不同。

造像底座为长方形平台，正面开长方形小龕。虽然造像距今已有1000多年，但仍能清晰地看到，龕上线雕着一位童子，头顶着一具香炉，童子两侧以浮雕的形式刻着一对狮子，鬃毛卷曲，身体蹲踞，张口瞪目。

在造像的两侧，能清晰地看到上面刻着的文字：“显庆五年四月卅日比丘尼行儒敬造弥陀像一铺，为皇帝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咸同斯福。”大意为，女尼为皇帝、师僧、父母及众生祈福而造像一铺。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刻文书写规整俊逸，线条道婉、轻灵。

造像背后的地域文化

佛教在山东地区的传播，开始于十六国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达到全盛。这时期僧徒活动频繁，建寺、造像、造塔等活动遍及山东各地。其中，济南、青州和东平以其遗存较多而成为当时的中心。“山东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唐代造像不在少数，但背屏式造像并不多见。”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员赵铮说，显庆年间造像则以济南柳埠千佛崖造像为代表。千佛崖造像位于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神通寺遗址内，包括武德、贞观、显庆、永淳、文明5个年号，前后延续约60年。像主有唐皇室成员，如

南平长公主、赵王李福、驸马刘玄意，也有一般官僚、僧尼和民众，造像绝大部分为唐初雕造。因此，研究显庆时期造像多以此为参照物。

从穿着来看，唐显庆年间千佛崖造像多为双颌下垂式袈裟，两肩衣领自然下垂至腹部，再上绕裹双臂。而聊城收藏的这铺弥陀造像穿的却是敞领式袈裟，右侧袈裟从胸前垂下，搭于左臂，这在北朝及隋代造像中常见。同时，这铺弥陀造像主尊佛像磨光高髻，面容长方清秀，五官较小；三尊造像皆上身较长，躯干呈筒状，体态较僵硬，这些特点传承了隋末唐初

的造像风格且有北朝“秀骨清像”的意味儿。

袈裟的穿着、身材比例等与济南柳埠千佛崖显庆时期造像并不相同，赵铮觉得，这可能与该造像为民间造像有重要关系，“因为茌平在唐代位于东平郡边隅，消息闭塞，造像样式跟不上时代，造像规制多依北朝及隋代样式。”

不过，这铺造像与千佛崖显庆时期造像相比较，虽大小形制相差悬殊，雕刻工艺迥异，但在风格上还能管窥一二。“在组合造像内容方面，唐代组合造像的特点多为一佛二菩萨像，组合简单而统一。”赵铮说，同时，从雕刻工艺来看，造像下方小龕内护法狮子颇具唐代风格，“十斤狮子九斤头”的夸张

变形手法，已高度地概括了唐代民间石狮的造型变化特点。要特别提及的是，早期石狮的那种原始狂野不羁、耀武扬威的霸气，已肃然收敛变为蹲踞。赵铮认为，相较于三尊造像，石狮更显出工匠手法和技艺的成熟。“由此推测，初唐时期民间匠人对镇门守户、辟邪赐福的石狮制作较多，雕刻规制和工艺手法都与时俱进”。

从这铺弥陀造像不难看出，初唐时期在山东西部佛教宗派流行上紧随时代，但在雕刻风格、表现形式上却比较滞后，地域艺术文化差距颇为明显，而正是这种差距给这尊石刻造像赋予了独特的魅力，也为后人研究佛教艺术推开了一扇门。



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向游客介绍馆藏唐代弥陀造像